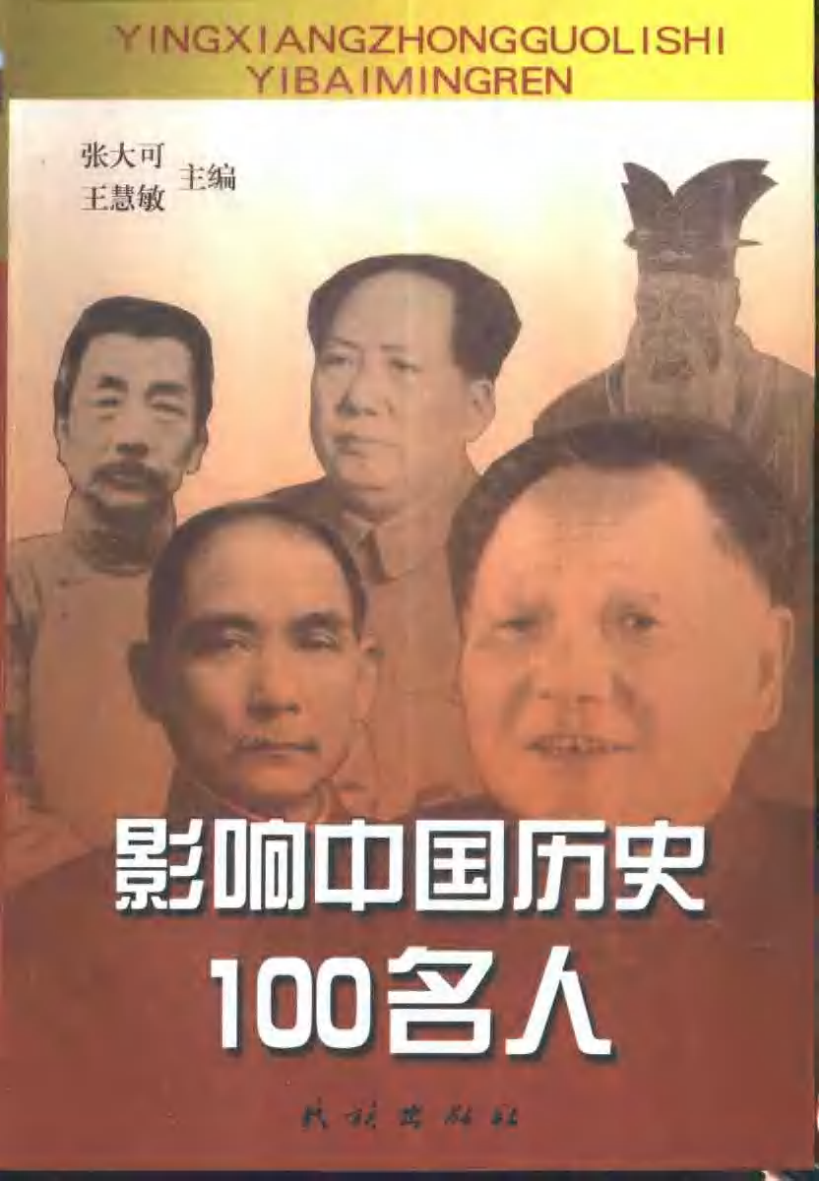


YINGXIANGZHONGGUOLISHI
YIBAIMINGREN

张大可 主编
王慧敏



影响中国历史 100名人

民族出版社

人生能有几回搏？请借鉴伟人的成功！

主 编 张大可
王慧敏

影响 中国历史 100名人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卓玛吉

封面设计:童行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中国历史 100 名人/张大可 王慧敏主编. -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7

ISBN 7-105-03505-6

I. 影… II. 王… III. 历史人物-列传-中国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665 号

152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慧田禾工作室照排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450 千字

印数:3001—13000 定价:28.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影响中国历史 100 名人

编 委 会

顾 问 杨纪珂 何乃光 蔡福金

主 编 张大可 王慧敏

副主编 李劲祥 李宝生

汪受宽 韦 苇

· 顾兆贵 张奇虹

作 者 (本书 54 位作者,依姓氏笔划为序列名如次)

丁启阵 马大品 王志功

王杰渝 王继光 王慧敏

丑洁明 白 奚 刘春梅

刘 波 吕 敏 乔宗传 任冠文

· 朱凤鸣 江 湄 汤明珠 刘喜堂

孙建强 孙 虹 张大可 张树桐

张奇虹 张克非 张久明 张 琪

陈冠英 韦 苇 李 小 李宝生

李劲祥 何乃光 汪受宽 吴以宁

吴锦荣 严家才 来可泓 周子燕

顾兆贵 顾吉辰 徐日辉 徐兴海

徐敏栩 徐黎丽 钱曾瑶 康 民

梁一仁 梁志胜 谢玉杰 蔡 华

蔡新职 魏明孔

卷 头 语

通过精选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限其数量，排列组合，形成纵横比较，藉以在比较中评价历史人物，考察历史棋局，反映历史大势，闪烁思想火花，惩恶劝善、启迪思维，以供评说，以供欣赏，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 1977 年出版了《历史上最有影响的 100 人》一书，提供了示范。在此启发下，产生了用比较方法总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评说华夏英杰的想法，这是策划本书的缘起。正式提出日程在 1988 年，由当时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张大可教授提出，得到汪受宽、左书谔两先生和王慧敏同志的支持，共同讨论，选录人物。1991 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西安召开，在学术交流中谈到这个课题，得到热烈响应，更得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宝生同志的支持，斟酌选目，正式组织撰稿，与会各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作者纷纷承担，遍及全国各地，现在作者积数达 54 人之多，说明本课题得到了共鸣。

1995 年张大可教授调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本课题得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领导支持，列入 1996 年院级规划项目，对篇目进行了调整，中央社院有五位作者加入，增强了活力。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杨纪珂、副院长何乃光、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蔡福金出任顾问。杨纪珂院长在学术委员会上对本课题的研究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

文化，弘扬民族英杰的创造性精神，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作者五湖四海，生动地体现了统一战线精神。”此外，杨纪珂院长还提出：“也要写几个反面人物，体现传统史学惩恶劝善的精神，善恶美丑对比，更有启发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增加了一个附录，收入十大昏暴奸佞，有暴君、女主、外戚、权臣、奸臣、宦官、军阀等各类祸国殃民的人物典型，更全面地反映历史棋局，增强本书的思想内涵。本书由张大可教授设计、定位，并作最后的统稿与定稿工作。篇目调整以后，《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王慧敏受其师张大可教授委托，对全书进行文字统稿，共同负主编责任。王慧敏以文学见长，对史学也有浓厚兴趣，他在兰州大学求学时就师从张大可教授学习中国历史，孜孜日进，近年来已初露头角。本书就是师生长期合作的一个成果。本书已三次再版，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次再版对收入的人物再次做了一些调整，导论也有修正，表明编著者并没有在成功面前停步，而是精益求精，不断深入认识，务期于完善。人民大学著名学者高放教授为本书作序，深表感谢。至此，本书前后历经了十多年，两次统稿，作者队伍不断充实，入选篇目再三斟酌，思想内涵不断丰富，是一部富有哲学思维的历史论著，大旨精神概括在《导论》中。

本书 54 位作者，四分之三是全国各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正副教授高职，可以说也是群英荟萃，阵容整齐。这是本书耐读、耐思，具有丰富历史哲学内涵的根本保证。希望本书构思布局的深层思想，叙述的历史知识与成功的历史伟人的风采，能带给读者以启迪，能提高读者的修养，能丰富读者的生活情趣与追求，这将是全体作者莫大的欣慰。

编委会

2002 年元月

序——以唯物史观精选中华英杰

惟我中华泱泱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赖兆亿炎黄子孙世代代精勤创新，奋发图强。其间涌现了众多英雄豪杰，他们作出了特殊突出贡献，值得后人作为学习楷模。总结出中华英杰的独特作用与成功经验，这是当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再铸中华辉煌的需要。由张大可教授与王慧敏共同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 100 名人》一书（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7 月初版），正是旨在师承先贤，激励来者。中华英杰成千上万，为何只精选百人呢？这是由于“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为数之极，又是为数之精。在古汉语中不是有“百灵百验”、“百发百中”等众多成语吗？如果选入千人万人，又不免数量过多。

要精选历代中英杰，又只限于百位名人，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标准来细挑。我拜读之后感到本书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本书精选得当的灵魂。提起唯物史观，也许有人认为它是见物不见人，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或者进而认为它只讲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抹煞了个人的重大作用。诸如此类的误解不一而足。其实唯物史观是非常全面、严整的科学世界观。它既见物又见人，指明了任何社会生产力都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它既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又重视个人在历史上正面的进步作用或负面的反动作用；既突出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主导作用，又注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9页)。又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同上书第4卷第695-696页)。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道德艺术与宗教、人民群众与个人之间,虽然有主次、起承、正反、源流等不同的关系与作用,但是它们都汇成为历史发展的合力。

按照唯物史观的上述原理,本书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不同领域精选出百名有特大贡献的人物。其中科技文化人物达57人,政治军事人物43人。把春秋时期鲁国的木工祖师公输般即鲁班、北魏时期的农业专家贾思勰、宋元时期的棉织工能手黄道婆等人选入百名中华英杰,就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首要性。把最早的经济改革家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的改革家战国时的商鞅、通西域的汉朝外交家张骞、创立两税法的唐朝财政改革家杨炎、七下西洋的明朝航海家郑和等选入本书,体现了改革与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把造字的仓颉、造纸的蔡伦、书法家王羲之、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东晋三绝(才绝、画绝、痴绝)画家顾恺之等文化名人选入是别具慧眼的。选入尊礼士人开自由学风的齐宣王,更是别具深意。把玄奘、慧能、宗喀巴选入是考虑到宗教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

本书在写作上也有特点。对每个人选人物的行文都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各个人物的姓名、生卒年之上加有一句简明的提

示定语，以表明各个人物的特殊贡献和身份，如建立多民族一统政权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第二部分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夹叙夹议评说人物的最突出贡献。第四部分余论，或补充内容，或对其历史功过作了提示。这样对人物层层递进的评价就较为全面、深刻。

全书在附录中又列出十个反面人物，即从荒淫暴虐的殷纣王受辛到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作为十大昏暴奸佞，列举出他们的历史罪行，这样给读者以善恶对照、忠奸对比。正面英杰精选百人，反面败类只列出十人。这也显示正气压倒邪气，好人远胜坏人，所以中华民族能够经久不衰，持续兴盛。

对于精选的百名英杰如何分类排列呢？这是需要悉心考究的。本书采取一种独特的纵横比较方法，即把百名英杰分为十编，每编十人。第一编是作为“民族之魂”的贡献最大的十个历史人物，他们起于黄帝、仓颉，终于毛泽东、邓小平。第二编至第九编是按政治家、思想家、文史学家、科学家、改革家、军事家等分类排列。第十编为在民间影响最大的人物，如陈胜、诸葛亮、关羽、岳飞等。这样每一编十人都是从古至今纵向排列，而从横向上看又可以大体上看出各个时期都有哪些杰出人物。这种分类排列只是编选者的一家之言，它固然给人们以重要启迪，但是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每编只限十人，这样不免有的选编不当。例如把胡适列入思想家，而鲁迅只算是文学家；把文学家列为第四编，而科学家却属第五编，我认为这也是错位。此外，思想家有两编：第三编和第七编；文史家也有两编：第四编和第八编，似乎选得过多了些。像刘知几、章学诚、王国维在史学上贡献很大，然而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百名英杰未必合适。从全面的唯物史观出发，就要从总体上来考察究竟哪些人在哪些方面五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两个文明建设，即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上起过最重大的作用，有过最深远的影响。希望编选者在再版时能够对

精选的英杰再作一些调整。例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为了体现民族融合与团结，似应把中华民族的第一位人文始祖、奠定了农业文明基础的炎帝即神农氏也选入本书。既然科技是重要的生产力，理应增加一些科技专家，如战国时秦国的水利专家李冰，为《九章算术》作注的魏晋时数学家刘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宋朝发明家毕昇等。

是为序。

高 放

2001 年元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顶斋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学者高放教授为本书第二版所作的序，精辟而全面地对本书作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实际上已开展了争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学者的风范，对读者具有启发意义。本书主持人张大可教授及全体作者非常欢迎大家来展开争鸣，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希望高放教授的序能引发争鸣。同时本次再版也吸纳了高放教授及学术界反馈的意见，增选了姬发、李冰、刘徽、张学良，以及当代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五个人物，相应删去了子产、葛洪、刘知己、章学诚、王国维五个人物，保持一百人物总数不变，炎帝已附见于黄帝传中，故未单独立传。汉武帝刘彻排入了第一编与秦始皇并列更符合传统的认识。由于毕昇的活字印刷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未入选。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导论》第4节提出：“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一试身手，在这一百个人物的名单中进行增减排序，总数以100人为限，按每个读者的增减从100人的总数中平衡，那么保留下来的，就是读者心目中的百分比。”当你做这样的尝试，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历史的熏陶，受到历史伟人思想品格的启迪，将不由自主地审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行为轨迹，不仅知识日增，而且修养提高，自觉地向历史名人学习。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惩恶劝善。所以说本书是一部使人开窍的书。高放教授的序，启迪思考，为本书增彩，再次致以衷心的感谢。

导论——闲话英杰说沧桑

本书《影响中国历史 100 名人》，是集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中一百名历史伟人于一堂来排名定位，评说高下，启人深思。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首创给人物排名定位的先例，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排座次，称为英雄聚义。给小说人物排名次，由于小说人物是作家创作的，人物贡献可以因文生事，较易排定。而历史人物，贡献大小，是历史造成，历史家不能因文生事，最多只能以文运事，排名次就困难得多。正由于此，中国历史家，从未有人想过要给中国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排名次。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 1977 年出版了《历史上最有影响的 100 人》，从全世界全人类中精心挑选一百人加以评长论短，排名定位，用这种方法来表述作者的一种历史观，简明生动，极富哲理，很快风靡全世界。1988 年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书，也备受中国读者的欢迎。随后出版界着手出版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有的独出心裁，如“一百个最有影响的男人”，“一百个最有影响的女人”等等，但大多依样画葫芦，了无新意，于是有了本书的编选。毫不讳言，本书是在哈特思维方式影响下运作的，但又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构建了一种新体系，这是本书值得自豪的。一百人如何选定？为什么只选一百人？排名定位按什么

标准？编选本书有何意义？如此等等的问题，读者可以无尽提出，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无限反思，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动力，启迪思维。本书宗旨，略述如次。

中国是人物传记的故乡，美国大百科全书就把世界上最早的传记作家选列在中国，司马迁第一，刘向第二。中国现代评述人物的传记著作落后于西方，不过近年来大有发展，至于古代则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正史以人物为中心，称纪传史。我国历代蝉联而下的纪传史，积数有 26 种，4042 卷，洋洋 4500 余万言，按各史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举世无双，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清末，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纪传体正史是以人物为中心叙事，它创始于《史记》，帝王称“本纪”，大臣称“列传”。司马迁这一创造，活生生地展示了社会各色人物的活动，它不仅是历史内容的创新，而且也是历史方法的创新。从内容上说，《史记》人物传记，可以说是全方位干预社会生活的纪实文字，它既是历史，也是文学，还蕴涵着深厚的哲理，所以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读来扣人心弦。从方法论上说，以人为中心叙述历史，在古代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它是对神意史观的一种否定。总上两点，以人为本位叙述历史，生动活泼，说理形象，有血有肉，易于普及，启人深思，在今天仍有意义，仍可借鉴。本书的编纂，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原则，以人物评传形式普及历史知识，启迪多元思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部纪传史，所选人物，或多或少，本无定数。人传标准，随史家观点而不尽相同，这都是很正常的。一部二十四史，每一史有一史的义例，但就入传人数，人选标准，很难理出规范义例，似乎多数正史，并无谨严义例。就当前学术界所出版的各种人物

传记，也很难规范出严格义例。其实义例就是编纂者的一家之言，总是带有或轻或重的主观色彩。当然义例主要是客观的反映，单一思维认为，客观才是规律，主观就是唯心，实际上纯客观也就无义例。义例是主观对客观的条理或系统反映，例如自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为五体，各体数日均寓有义例。如十二本纪，像一年有十二月，八书为四季之倍，三十世家像一月有三旬，七十列传为七十二之成数，七十二像周天三百六十度的五分之一，五行哲学每行为七十二，合五行为三百六十，十表之十为数之极。《史记》五体的数目安排，象征天道运行，寓意天人和諧，所以是一个人工精意制作的系统工程。五体数目既定，入传人物就要受到限制，如此必然产生严格义例。本书选定一百人，以这数目作为限定值，本身就是一个义例。单就一百数目而言，是一个随意数值，由笔者参与编选的海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就选编了二百人，历史伟人成千累万，选编二百人、三百人或更多的人，未始不可。但是太多、太随意，就无义例。数目过小，易失偏颇，数目过大，必流于随意。我觉得哈特限定的一百人，恰到好处，数目不大不小，极好作文章。一百是一个整数，它是人们常用来表示比较完满的数目，例如百分比，百分制等等。一百数目，可以再下分十组整数，十也是一个整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数之极。所以本书也选定一百，并安排 10×10 的谨严义例来排定人物，构画中国历史的五千年，评说一百历史人物的影响，安排他们的序列，指出他们的独特创造，这就不能是随意的了。单个的人好比是一个电子元件，容易评论是非，如果把一百人组合起来推演历史棋局，就好比是由集群电路组装的电器，它将显示无限的神力，产生系统效应，表达种种思想。这效应，这思想就是作者个性思维的学

术体系。每个读者可以再创造，可作新的排列组合，无疑是特具神韵的。

2 历史人物有正面，有反面，他们对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都可以说是英杰人物。有时正面、反面并不是绝对的，有的人物正反皆备，可以称作双重性格的历史人物，往往最杰出的人物都具有双重性格。古人云：才过百人谓之杰，智过万人谓之英（参阅《礼记·礼运》注及《淮南子·泰族训》）本书正编一百正面人物，附录十个反面人物，是遵循中国历史传统的。中国传统史学惩恶劝善，历史记载总以正面英雄为主。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做了如下的理论概括：

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可见惩恶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一个优秀传统。演说故事，反面人物的情节更为生动。惩恶劝善，不能不以正面人物为主。影响历史进程自然也是以正面人物为主。本书入选有反面人物，而主要以正面人物为主体内容，这不仅符合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且也是符合历史进程的。不过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审视，正面反面都不要绝对化。绝对化往往走向单一思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其实对于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从简单的好坏二字定评，也不能搞什么三七开或四六分，而应当是功过毕书，留待读者去评说。古代的封建帝王，尤其是雄主，一般都是双重性格，简言之有大

功亦有大过，或者说既伟大而又渺小。伟大是他的超人举动；渺小则是他有同凡人的血肉之躯的正常表现。由于环境地位不同，留下许多折光。所以我们要用多维思考去审视历史人物，既把握主流，也不要增饰或掩恶，这是本书力求要做到的一点。读者也应从这一原则在阅读中进行再创造，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必求定论，不必求答案，方能获得更多的启迪。人物分正反，也是一种从俗的习惯，因此，对明显的正面、反面人物分了正编与附录加以区别，反面人物不计入“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之列，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故全书110人，标题为100人，特为之说明。

我们几十年来评价历史人物，专门性的理论文章不少，提出了许多评判标准，但最终跳不出用百分法作评价、鉴定的标准，即用三七开、四六分或对半分来界定。例如对曹操的评论，一般看法也以三七开表述为功大于过而作结。有人对曹操作功过参半的界定，被讥为形而上学。其实功过参半的分析方法，并不是简单的五五分，其意义在于功过都不应忘记，应该说这才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法。所谓三七开或四六分，往往因界定功大于过而无过，或过大于功而失功，可见用百分法作结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那么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呢？我们认为用纵横比较法，可以大致得其平。横的比较，是看他的时代性，他在自身所处时代里，做了他人做不到的事；纵的比较，是看他的创造性，他所取得的功业，是否承先启后，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流风余韵馨及后世，由此在历史函数的坐标上，对每个人的长短高下、功过是非，就能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像孙权，前期英武有为，后期昏聩暴虐，可以说三国史上有两个孙权。这里不存在有三七开、四六分，前期之功不能掩后期之过，后期之过不能抹煞前期之功，

只有将功与过分开，探讨其功与过各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3 入选本书的人物，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其一，贡献大小；其二，口碑影响；其三，浩然正气；其四，创始影响；其五，警世取喻。贡献大小，不言而喻，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但就是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在理论上争议却最大。不同的历史观点对同一人事的看法却有天差地别。秦始皇、汉武帝贡献最大，没有争议，而曹操的贡献就有争议了。李自成、洪秀全他们的贡献就更有争议了。这仅仅是就同一类型的人物比较。如果跨类来看，那就更成问题。发明造纸术的蔡伦，贡献是大还是小？如何把蔡伦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提并论呢？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来看，文化的积累，一代一代经验的沉淀，对于历史的影响无可估量。在这个意义上，蔡伦对于历史的贡献比任何帝王都要大。一般来说，帝王影响主要就是生前那么几年或几十年。他所建立的国家、缔造的制度，影响几百年或几千年都只是个别的。而这一个别的，也可以说是从某一个侧面所作的相对立论。例如说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影响中国两千年，也就是这样的相对意义。而科学技术的发明，可以有无限的影响，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几万年都无法作尺度。人类社会进入蒸气时代到电子时代，突飞猛进的速度何止是几百年几千年？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看马戏团的动物作高难度动作表演，或看“动物世界”中大千世界的斗智斗勇，假如动物也有语言能够传递和积累一辈又一辈各别动物先辈的生活经验，我们人类还能主宰这个星球吗？成语中有“狼狈为奸”，那狼，那狈，无论多么狡狴，始终处于最原始的个体生态环境中，所以它们不能进步。人类如果没有语言，也许至今仍处于原始状态。如果没有仓颉造字和蔡伦发明造纸术

来传播语言，打破时间、空间的界限，那么人类也许至今还处于青铜与铁器的时代。因此，发明语言的，发明文字的，发明造纸的，发明印刷的，等等。而推及于一切科技、文化的发明者、创造者，他们的贡献都应大于帝王。本书人选了文化科技人物过半数，达 57 人，政治军事人物 43 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代，不仅有伟大的帝王，而且更有伟大的科技文化伟人。今日中国的落后，原因之一不正是封建帝王们的阻滞文化科技而带来的吗？中华民族既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必将有奋起之日，绝不逊于任何民族，而立于世界之林。我们正在奋起直追，缅怀先人，是可以受到鼓舞的。

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贡献和影响是多侧面的。例如范蠡经商，过去只是把它作为隐身避祸的美谈，以今日观点来看，他应是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表现。当他在政治上不能发展，甚而有祸，于是功成身退，另谋出路。西汉留侯张良隐退避祸，导引辟谷，只不过是苟延天年，而范蠡则是另寻人生的创造，与张良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两人的历史条件不同，范蠡处于列国纷争之际，本国不容，可到他国去发展，去经商，去从政，都是可以的。张良生活在大一统时代，他隐退避祸，似乎只有导引辟谷，苟延天年一途可走。我们既作比较，而又不作机械比较，才能公允论人。当然在一百人的限数内，无论范蠡，还是张良，都进不了这一个圈子。但创始人物，其流风余韵馨及后世，那又另当别论。如黄道婆，名不见经传，但她推广棉纺技术，影响人们生活已近千年，本书人选了她。如齐宣王尊重知识，开一代自由学风，在中国封建社会惟此一人，有如此气魄，如此雅量，而秦始皇则视知识如洪水猛兽，焚书坑儒，两人比较不待评说而高下自见。当然秦始皇对历史的全面影响又是齐宣王不能望其项背的。又如赵武灵王